

# 眉县盨器群的族姓、年代及相关问题\*

韩巍 (北京大学)

2003年初,陕西眉县杨家村出土西周单氏家族青铜器群,其中的逯盘铭文记录了该家族8代人的世系,史料价值极高<sup>①</sup>。上世纪50年代,杨家村附近还出土过一组铜器,器主名叫“盨”<sup>②</sup>。其中的方尊、方彝铭文称“文祖益公”,说明盨是益公之后。益氏是西周时期的大世族,其宗子益公在西周中后期铭文中经常出现,是地位很高的王朝卿士。逯盘铭文中,单逯的四世祖称为“惠仲盨父”,学者多认为“盨”与“惠仲盨父”是同一人,这两群铜器属于同一家族<sup>③</sup>。于是很多学者得出这样一个推论:益氏是单氏家族的一个分支<sup>④</sup>。单氏为姬姓,那么益氏自然也是姬姓。到目前为止,我们还没有看到不同意见。但是翻检金文,我们却发现一些足以构成反证的材料,在这里提出来,希望引起学界注意。

## 一

1961年10月,陕西长安县张家坡发现一铜器窖藏,共出土有铭铜器32件<sup>⑤</sup>。其中有4件元年师旻簋(8:4279-82),铭文称“文祖益仲”,说明器主师旻是益氏族裔;另有3件五年师旻簋(8:4216-18),形制、纹饰较前者略早。这个窖藏很可能属于师旻的家族,也就是益氏的一个分支。值得注意的是,该窖藏还出有3件外族所作的媿器。铭文如下:

简侯盘(16:10096):简侯作叔姬媿盘,其永宝用飨。

伯百父盥(15:9425):伯百父作孟姬媿盥。

伯百父盘(16:10079):伯百父作孟姬媿盘。

“简侯”之“简”同“郇”,为文王子所封国,其地在山西临晋<sup>⑥</sup>。伯百父亦属姬姓。该窖

藏还出土伯庸父鬲8件(3:616-623),铭文曰:“伯庸父作叔姬鬲”,此叔姬当即郇侯之女,伯庸父之妻<sup>⑦</sup>。又有伯梁父簋4件,铭文曰:“伯梁父作媿姑尊簋”,郭沫若先生认为媿姑可能是伯梁父的妻或母。伯庸父和伯梁父应该都是器群的主人。因此郭沫若指出,这一器群的主人不是姬姓,而与姬姓和媿姓通婚。既然该窖藏属于益氏的后裔,按照周人同姓不婚的原则,益氏就不会是姬姓。

益氏究竟是什么姓?1997年出土于扶风县段家乡大同村的宰兽簋(近2:490)为我们提供了一条证据<sup>⑧</sup>。该器铭文称“朕烈祖幽仲、益姜”,益姜应该是幽仲的配偶,宰兽的先妣。金文中的女性称谓,一般是在姓前加行第字、谥号或族氏。益姜的“益”字显然不是排行,也不是谥号<sup>⑨</sup>,而只能是族氏。确定“益”是族氏,还可能存在两种情况:一、“益”为夫氏,即幽仲、宰兽家族之氏,益氏与姜姓通婚,当非姜姓,但不能确定是什么姓;二、“益”为父氏,益姜是益氏之女,那么益氏应为姜姓。

我们认为第一种可能性可以排除。簋铭记载周王册命宰兽“更乃祖考,鞞司康宫王家臣妾仆庸外内”,说明宰兽的家族世袭为“宰”,管理康宫内的王室家产,属于“内臣”<sup>⑩</sup>。而益氏大宗的益公世代为王朝卿士,位高权重;在乖伯簋(8:4331)铭文中,益公还带兵征伐过眉敖。据盬方尊铭文记载,盬的职务是“司六师王行三有司”以及“六师累八师執(艺)”,也是地位很高的军政长官。元年师旻簋铭文中,天子册命师旻“官司丰還左右师氏”;而在五年师旻簋铭文中,他也曾带兵东征,因此他属于武官系统的“师氏”。由此可见,益氏家族无论大宗还是小宗,担任的都是执掌军政大权的“外朝”职官,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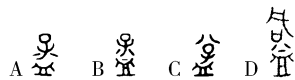
尤其带有浓厚的军事色彩，与宰兽家族担任的“内朝”官性质截然不同。在周代世官制度下，同一家族内部不太可能出现这种情况。因此我们认为益姜之“益”应是其父族之氏，益氏应该是姜姓。

要确定这一结论，我们还需对几条似为反证的材料加以澄清。

第一，宋代著录的元年师匄簋（8:4342）<sup>①</sup>，铭文称“朕烈祖乙伯、同益姬”。1959年陕西蓝田县寺坡村出土的十七祀匄簋（8:4321）<sup>②</sup>，与元年师匄簋为同一人所作，铭文称“文祖乙伯、同姬”。与两件匄簋属于同一家族的还有传世的师酉簋（8:4288-91），铭文称“朕文考乙伯、亮姬”。“同益姬”、“同姬”、“亮姬”应该是同一个人<sup>③</sup>，至于为什么会出现称呼上的差异，学者有不同看法。郭沫若先生认为“同”字是指妇人之字与丈夫相同，“亮”字为其本名，“益”是氏族名，即“益公”之“益”<sup>④</sup>。朱凤瀚先生认为“亮”为谥号，“同”为师酉、师匄家族之氏名（即姬夫家之氏名），“益”为亮姬之父氏<sup>⑤</sup>。按照这种说法，“同益姬”是益氏之女，益氏就应该是姬姓。

我们觉得这一说法不无疑问。十七祀匄簋与弭叔师察簋以及弭叔鬲、盥、壶等铜器一同出土，匄的职务与弭叔一样是师氏；他们应该属于同一家族，也就是弭氏<sup>⑥</sup>。因此“同益姬”的“同”字不应是夫家师匄家族的氏名，而应是父家的氏名。同氏也是西周时期的重要世族，早期有“同公”（8:4201小臣宅簋），晚期有“同仲”（8:4274元年师兑簋等）。唐兰先生认为“同”即“凡”字，同氏就是《左传》僖公二十四年称为“周公之胤”的凡氏<sup>⑦</sup>，其说可从<sup>⑧</sup>。两周金文女性称谓有将父氏和夫氏叠加于姓前的形式<sup>⑨</sup>，但这种形式多见于女性自称，未见用于称呼先妣、先母者，因此“同益姬”也不会是这种情况。我们提出一种推测：“同益姬”的“益”字有可能是“孟”字的误摹。春秋时期金文常在“孟”字上部的“子”旁下加两点饰笔<sup>⑩</sup>，而西周晚期的伯家父簋铭文中，“孟姜”的“孟”字上部有一“八”字形，可看作这种饰笔的源头。在铭文残泐的情况下，这种带有饰笔的“孟”字很容易与“益”字相混；

元年师匄簋铭文中，“同孟”二字相连，“同”字的“口”旁与“孟”字的上部更难以区分（图一）。传世的宋代金文摹本多有摹写走形的现象，此处出现误摹的可能性还是相当大的。



图一

- A. 9:4574铸公瑚 B. 16:10144 曹公盂  
C. 7:3856 伯家父簋 D. 元年师匄簋“同益”二字

第二，盩驹尊铭文说：“王弗望（忘）厥旧宗小子”，很多学者认为，这说明盩是周王的同姓子弟<sup>⑪</sup>，那么盩所属的益氏家族就应该是姬姓。我们觉得这个问题还值得重新考虑。除盩驹尊外，金文中“宗小子”一词仅见于何尊（11:6014）：“王诰宗小子于天室”，此处“宗小子”可以理解为周王同宗晚辈的专称。但是在盩驹尊铭文的“旧宗小子”之前还有一个领格代词“厥”，说明“旧宗小子”并不像何尊的“宗小子”那样是一个专用名词。驹尊铭文中有一句话：“王棚下不（丕）其（基），则万年保我万宗”，类似的文句也出现在方尊、方彝铭文中，作“王不（丕）段不（丕）其（基），万年保我万邦”。细味文意，“万邦”是泛指天下所有的邦国，“万宗”则是泛指天下所有的宗族。可见，“宗”在这里的含义等同于“族”，“旧宗”应该是指与周王室关系密切的旧族。盩的家族益氏为姜姓，姬、姜二姓很早就互为婚姻。据刘启益先生研究，西周王朝每隔一代就有一位姜姓王后<sup>⑫</sup>，可见姜姓与周王室关系之密切。益氏家族很可能与周王室有姻亲关系，那么周王称益氏的晚辈盩为“旧宗小子”也是合乎情理的。

第三，传世铜器有毕鲜簋（7:4061），铭文称“皇祖益公”，作器者应为益氏后裔。此器未见器形，字体属西周中晚期，唐兰先生定于夷王时<sup>⑬</sup>。刘启益先生认为毕鲜为毕公之后裔，毕鲜之皇祖为益公，则益公也应是毕公之后<sup>⑭</sup>。那么，益氏就成了毕氏的一个分支，毕氏出自文王，益氏自当为姬姓<sup>⑮</sup>。我们觉得此说也有疑问。西周时期，凡是小宗从大宗独立出来，被命以新的“氏”，就不会再使用大宗的氏名<sup>⑯</sup>。如果益氏是毕氏的分支，“毕鲜”就不应该使用大宗毕氏的氏名，而应称“益鲜”。因此我们认

为”毕鲜”并非毕公之后，而是益氏族裔之改封于毕地者，与《左传》中先軫封于原而称“原軫”，士会封于随而称“随会”同例。望簋（8:4272）铭文称“死司毕王家”，可见毕地有王室的财产；西周早期的召卣器（16:10360）铭文记载，王赏给召“毕土方五十里”，可见周王曾经把毕地的土地赏赐给臣下。西周中晚期可能有一支益氏后裔改封于毕地，从此以“毕”为氏，与文王之后的毕氏并非同一家族。

综上所述，我们有理由认为盨器群所属的益氏家族不是姬姓，而是姜姓。因此，益氏不可能是姬姓单氏家族的分支。

## 二

学者认为盨和单逖的祖先惠仲盨父是同一个人，主要有三点依据：一、两个窖藏距离很近，可能属于同一家族；二、盨的父亲“大仲”与惠仲盨父的父辈“新室仲”排行相同；三、盨和惠仲盨父的称谓都有一个“盨”字。我们觉得这几个依据都值得怀疑。

根据金文人名称谓的通例，“惠仲盨父”是字，“盨”是名，两者的性质是不同的。金文称“字”，往往在后面加一个后缀式的男子尊称“父”（也作“甫”），前面加“伯仲叔季”等行第字，或者再加氏名或官名，对于已去世的祖考也有加谥号的<sup>⑦</sup>。“惠仲盨父”就是“谥号+排行+某父”的标准形式。古人称字是表示对人的尊敬。金文中凡称字的场合，或者是在不出现他人的情况下用于自称，或者是用来称呼父、祖以及地位高于自己的人，“惠仲盨父”就是单逖对祖先的尊称。君主称臣下，上级称下级，则大多直呼其名，臣下在君主面前更是自称其名而不敢称字。《礼记·曲礼上》“父前子名，君前臣名”，这一点在金文中表现的非常明显。在西周大量册命赏赐类金文中，臣下自称字的例子极为少见<sup>⑧</sup>。盨器铭文记录的是天子对盨的赏赐、册命，还多次以“盨曰”的口气颂扬天子的恩德。按照礼制，“盨”在这里不可能是字，只能是名。“盨”和“惠仲盨父”一为名，一为字，一个人的名和字是不太可能采用同一个字的。因此我们认为这两个称谓并不是同一个人，而应该是

两个不同的人。

周原和丰镐遗址都是贵族聚居之地，建筑、墓葬、铜器窖藏鳞次栉比，相隔不远的两个窖藏分属两个家族的事情司空见惯。眉县杨家村一带虽然不是那样的中心都邑，但是居住有两家以上的贵族也是很正常的。何况盨器群的年代要早于单氏器群，两个家族可能是先后定居于此。至于“大仲”和“新室仲”排行相同，则纯属巧合，周人习惯在称谓中用行第字，重合的几率非常大。单逖的家族世袭为虞官，管理山林川泽；益氏则主管军政，族人多担任武官师氏。从世官制度来讲，单逖和盨也不太可能属于同一家族。

关于盨器群的年代，学者向来有不同意见。李学勤定于穆王晚期<sup>⑨</sup>，郭沫若、唐兰定于懿王<sup>⑩</sup>，陈梦家、刘启益定于恭王<sup>⑪</sup>，彭裕商等先生定于懿孝时期<sup>⑫</sup>。单氏器群发现以后，学者既然认为盨与惠仲盨父是同一人，逖盘铭文又说惠仲盨父曾服事昭王、穆王，于是很多人提出盨器群的年代过去定得偏晚，应该提前到昭穆时期<sup>⑬</sup>。现在我们既然证明盨与惠仲盨父并非一人，就有必要重新考虑这个问题。

先从铭文内容来看。盨方尊、方彝铭文中，册命仪式的“右者”为穆公；驹尊铭文中，代天子呼召盨的人是师虞。穆公自作的铜器有穆公簋盖，饰有穆王时期流行的大鸟纹，李学勤先生定为穆王晚期，其说可从。此外，穆公还见于戡簋（8:4255）和尹姑鬲（3:754-755），前者有“取微五鬲”这种常见于西周中期晚段及晚期的用语，年代应该不会太早；后者作于穆公死后，学者多定于恭王时。因此，穆公大概主要活动于穆王后期，下限可能进入恭王前期。师虞与师遽方彝（16:9897）、师遽簋盖（8:4214）的器主是同一人。师遽方彝的“右者”是宰利，此人又见于穆公簋盖<sup>⑭</sup>，说明师遽的活动时代与穆公有一段重合。师遽簋盖属于中期晚段流行的全瓦纹簋，其册命地点在“新宫”，多见于恭王前后金文。师遽方彝的年代，学者多定为穆王晚期至恭王时，簋盖有学者认为可能晚到懿王时。盨方尊、方彝记载的册命仪式，已经具备了各种要素，接近西周中期晚段的固定形式。陈梦家先生指出，只有到恭王时期，右者和史官代宣王命的制度才具体见于铭文<sup>⑮</sup>。综合以上各点，我们认

为将盞器群定在恭王时期比较稳妥。

再从器形和纹饰看。盞方尊和方彝是一对配套使用的酒器，其形制与西周早期的方尊、方彝不同，器身特别矮小，两侧有上卷如象鼻状的耳。与盞方尊相似的铜器有小子生尊和服方尊<sup>④</sup>。前者器身饰垂冠大鸟纹，后者饰兽面纹，唐兰、刘启益等先生均定于昭王时<sup>⑤</sup>。此二器比盞方尊更加瘦高，纹饰也显得偏早，年代应早于盞方尊。与盞方彝类似者，有师遽方彝和井叔方彝；三器造型基本相同，纹饰虽有差别，但风格非常接近。其中井叔方彝出土于沔西张家坡墓地 M 170，发掘者将此墓所属的井叔家族墓群排在该墓地的第三期，相当于共懿孝时期<sup>⑥</sup>。朱凤瀚先生进一步指出，M 170 在井叔家族墓群中年代最早，相当于穆恭之际<sup>⑦</sup>。可见这种形式的方彝流行时间非常短，大约从穆王末年到恭王时期。这与我们从铭文内容得出的结论是一致的。

因此我们认为，盞器群的年代还是以定于恭王时期比较合适，上限可能会进入穆王晚期，但不太可能早到昭穆之际。

### 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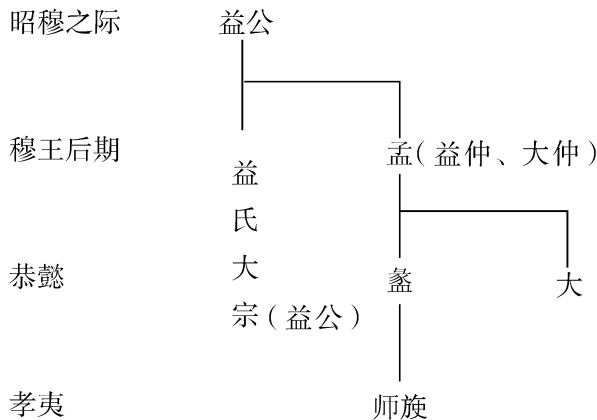
盞驹尊铭文的“文考大仲”，可能主要活动于穆王时期<sup>⑧</sup>。传世铜器有大簋（8:4165），铭文称“朕皇考大仲”；陈梦家先生定此器于恭王时，并认为大之“皇考大仲”与盞之“文考大仲”是一人，大与盞是兄弟<sup>⑨</sup>。此器为夔口垂腹，兽首衔环耳（环已失），圈足下有三圆柱形矮足，口沿下饰窃曲纹<sup>⑩</sup>。与此器最为相似的是陕西耀县出土的殷簋（近 2:487），铭文有“周新宫”，当为恭王前后器<sup>⑪</sup>。因此陈先生之说可从。

长安张家坡窖藏出土的元年师族簋，铭文称“文祖益仲”。元年、五年师族簋的年代，郭沫若、彭裕商定为厉王<sup>⑫</sup>，陈梦家、唐兰定为懿王<sup>⑬</sup>，刘启益、王世民等先生定为夷王前后<sup>⑭</sup>。元年师族簋为西周中晚期常见的敛口圈三足簋，盖顶及腹部饰瓦纹，盖缘及口沿下饰兽面纹演变而来的窃曲纹，与它相似的有弭伯簋、弭叔簋、师夔簋等器<sup>⑮</sup>，我们认为定于夷王前后比较合适。五年师族簋形态与大簋有些相似，但圈足下

三小足钩卷成象鼻状，盖顶、盖沿及腹部饰直棱纹，盖缘及口沿下饰分尾鸟纹，年代当较元年簋稍早，或可到孝王前后。师族的祖辈益仲很可能活动于穆王时期，与大仲的年代相吻合。因此我们认为益仲与盞的父亲大仲可能是同一人。

张家坡窖藏还出土 3 件孟簋（8:4162-64），铭文说“朕文考累毛公、遣仲征無夷”，学者多认为与班簋（8:4341）铭文记载的毛公东征是同一件事，故定为穆王时器<sup>⑯</sup>。此器为敞口鼓腹的方座簋，器身饰顾首垂冠的大鸟纹，正是穆王时期的风格。从时代看来，孟有可能就是益仲（大仲），也就是盞和大的父亲，师族的祖父。孟的文考可能就是盞的“文祖益公”，他曾参加毛公领导的东征战役，这次战役可能发生在穆王前期。但此役之后不久，在孟作器之时，他就已经去世了，因此他可能主要生活在昭穆之际。孟簋铭文说：“毛公赐朕文考臣”，可见孟的文考地位要低于毛公；盞称他为“益公”，应该是后代的追尊，在他生前未必能够使用“公”的称号。

穆王以后，益氏大宗世代称“益公”，地位尊显。而孟（益仲）的后代已经从益氏大宗分出，成为独立的小宗。孟之所以被称为“大仲”，可能因为他是宗子益公的母弟，同时又是本分支的始祖<sup>⑰</sup>。这个家族是仍称“益氏”，还是被命为新的“氏”？现有资料还无法说明。盞和大宗都是孟之子，从盞器铭文看来，继承宗子之位的可能是盞。师族有可能是盞的儿子，此时这一家族已从眉县杨家村一带迁到了沔西<sup>⑱</sup>。我们试将这个家族的世系排列为下表：



值得注意的是，上世纪 80 年代在沔西张家

坡村西南发掘的大片西周墓中，有 20 余座偏洞室墓，大多集中分布于墓地北区东部，年代主要在西周中期<sup>①</sup>。梁星彭先生认为这些偏洞室墓的族属与竖穴墓有别，源自西北辛店、刘家等类型遗存，属古代羌族的某一支系<sup>②</sup>。出土师族簋等铜器的窖藏就位于这片墓地东面不远处<sup>③</sup>，我们认为该窖藏可能与墓地有关。益氏为姜姓，“姜”即是“羌”，这片洞室墓有可能是益氏族人的墓地。益氏的兴起大约在昭穆之际，与墓葬的年代相合。但是这些墓葬均为中小型墓，墓主应该属于该家族的中下层成员。益氏上层贵族的墓葬在哪里？这片墓地究竟是属于益氏大宗，还是小宗益仲一支？这些问题还有待考古工作的证明，已发掘墓葬的东面可能还有大片墓地，值得关注。益氏族人的墓地紧邻井叔家族墓地，井氏也是西周中期的大世族，两个家族的关系究竟如何，也有待继续探讨。

#### 注 释

\* 本文所用金文资料，若不加说明，皆引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《殷周金文集成》，中华书局，1984—1994年；直接在器名后用括号标注，形式为“卷数：序号”。另有部分铭文引自刘雨、卢岩《近出殷周金文集录》（中华书局，2002年），标注形式同前，前加“近”字以示区别。铭文采取宽式释文，对一些已有定论的常见字词直接写出通用字，不加括注。

① 参看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等《陕西眉县杨家村西周青铜器窖藏发掘简报》，《文物》2003年6期。

② 参看郭沫若《盨器铭考释》收入《郭沫若全集·考古编》第六卷《金文丛考补录》110~138页，科学出版社，2002年。这群铜器包括方尊一件（11：6013）、方彝两件（16：9899、9900），驹尊一件（11：6011），驹尊盖一件（11：6012），均为“盨”所作，方尊、方彝铭文大体相同，二驹尊亦同铭。近年董珊先生将器主之名释为“猛”（《略论西周单氏家族窖藏青铜器铭文》，《中国历史文物》2003年4期），本文仍从旧说。

③ 参看马承源等《陕西眉县出土窖藏青铜器笔谈》，《文物》2003年6期；李零《读杨家村出土的虞速诸器》《中国历史文物》2003年3期；董珊前引文。

④ 杨亚长先生认为盨的“文祖益公”即单速的二世祖“公叔”，益公可能是字或谥（《金文所见之益公、穆公与武公考》《考古与文物》2004年6期）。我们认为其说不可取。“益公”显然不可能是字，金文中所见谥号基本上都可得到文献印证，但文献中未见有“益”字用作谥号之例。因此，益公之“益”仍当理解为族氏。

⑤ 参看郭沫若《长安县张家坡铜器群铭文汇释6》，原载《5考古学报》1962年1期，收入《郭沫若全集·考古编》第六卷，275~316页，有改动，本文引用郭氏意见以后者为准；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《5长安张家坡西周铜器群6》，文物出版社，1965年。

⑥ 参看陈槃《5春秋大事表列国爵姓存灭表撰异（三订本）》6册四，665页，台北：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，1997年。

⑦ 郭沫若最初认为伯庸父鬲是为其妻叔姬所作之器，又说筍侯即伯庸父（《5考古学报》1962年1期）。但筍侯盘明明是筍侯为其女叔姬所作媵器，伯庸父不可能既是叔姬之夫，又是叔姬之父。陈梦家指出郭说前后矛盾，伯庸父与筍侯并非一人（《5西周铜器断代6》，212页，中华书局，2004年）。郭氏后来改正旧说，认为筍侯是伯庸父的岳父（《5郭沫若全集·考古编》第六卷）。

⑧ 参看罗西章《5宰兽簋铭略考6》，《5文物》1998年8期。

⑨ 西周金文中先妣、先母的谥号通常与先祖、先考相同，此处如称谥号，则应称幽姜0。

⑩ 参看张亚初、刘雨《5西周金文官制研究6》，中华书局，1986年，40~42页。

⑪ 该器最早著录于薛尚功《5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6》卷十四（中华书局，1986年，六九页），器形已失传。

⑫ 参看段绍嘉《5陕西蓝田县出土弭叔等彝器简介6》，《5文物》1960年2期。


⑬ 对于师酉和师甸的关系，学界存在两种意见。一种认为师酉是师甸之父，师酉之父乙伯0即师甸之祖；另一种认为师甸是师酉之父，两器铭文的乙伯0并不是同一人。近出师酉鼎证明，前一种意见更为可信（参看下引朱凤瀚文）。同益姬0、同姬0、亮姬0应该是同一人，即师酉之母、师甸之祖母。

⑭ 郭沫若：《5弭叔段及甸段考释6》，参看《5郭沫若全集·考古编》第六卷，255页。

⑮ 朱凤瀚：《5师酉鼎与师酉簋6》，《5中国历史文物》2004年1期。

⑯ 1963年蓝田县辋川公社新村出土弭伯师簋（8B4257）（应新等《5陕西蓝田县出土的西周铜簋6》，《5文物》1966年1期），器主弭伯应为弭叔师察之兄。传世尚有弭仲瑚（9B4627）、弭伯匜（16B0215）等铜器，也都出土于蓝田附近，可见弭氏家族的封地就在蓝田一带。

⑰ 唐兰：《5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征6》，318、325页，中华书局，1986年。

⑱ 西周金文中同氏之/同0字，多作形，右侧一竖下端向外撇出，与一般的/同0字不一样，而与/凡0字类似（参看容庚《5金文编》6，545~546、881页，中华书局，1998年）。疑此字本为/凡0字，作为族氏时，加/口0旁以示区别，遂与/同0字相混。

⑲ 如苏冶妊鼎（4E2526）的/苏冶妊0是夫氏在前，父氏在后；而苏卫妃鼎（4E2381-84）的/苏卫妃0是父氏在前，夫氏在后。

⑳ 参看容庚《5金文编》6，988页。

㉑ 此点似由陈梦家先生最早提出（《5西周铜器断代6》，171页），刘启益、董珊等先生均采此说（参看刘启益《5西周纪年6》

- 266页, 广东教育出版社, 2002年; 董珊前引文)。
- 刘启益: 5西周金文中所见的周王后妃 6, 5考古与文物 6 1980年 4期。
- 唐兰: 5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征 6, 502页。收入 /附件一0, 定名为 /毕盖簋0。
- 刘启益: 5西周纪年 6, 267页。另外, 杨亚长先生认为此益公为毕氏, 且与夔簋 (8B4153) 的 /皇祖益公0 可能是同一人 (参见注 ¼ 引杨文), 他仍是将此处的 /益公0 理解为谥号, 前注已辨其非。
- 但此说与益氏为单氏分支的说法也难以相容。
- 例如燕国从召氏分出, 从此以 /匱 (燕)0 为氏, 不再称召氏。
- 参看盛冬铃 5西周铜器铭文中的人名及其对断代的意义 6, 5文史 6 十七辑, 中华书局, 1983年。
- 目前所见的例子只有师奎父鼎 (5B2813) 和师毛父簋 (8B4196)。兮甲盘 (16B10174) 虽然在铭末自称 /兮伯吉父盘0, 但是在铭文中追述自己从天子征伐、受天子册赏时, 仍然自称 /兮甲0。
- 李学勤: 5穆公盖盖在青铜器分期上的意义 6, 原载 5文博 6 1984年 2期, 收入 5新出青铜器研究 6, 68~ 72页, 文物出版社, 1990年。
- 郭沫若: 5盨器铭考释 6, 收入 5郭沫若全集# 考古编 6 第六卷, 110~ 138页; 唐兰 5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征 6 /附件一0 将盨器归入 /懿王0 下。
- 陈梦家: 5西周铜器断代 6, 169~ 174页; 刘启益 5西周纪年 6, 265~ 267页。
- 彭裕商: 5西周青铜器年代综合研究 6, 344~ 345页, 巴蜀书社, 2003年。另外, 马承源主编 5商周青铜器铭文选 6 (文物出版社, 1986年), 王世民、陈公柔、张长寿 5西周青铜器分期断代研究 6 (文物出版社, 1999年) 等也持类似意见。
- 参看马承源等 5陕西眉县出土窖藏青铜器笔谈 6, 5文物 6 2003年 6期。
- 学者多认为宰利与利鼎 (5B2804) 的器主是同一人。利鼎的年代过去一般认为属恭王时, 其形制为立耳盆形鼎, 口沿下饰两周弦纹, 与厉王时期的大鼎 (5B2807) 相似。近年有学者认为该器当属夷厉时期 (彭裕商 5西周青铜器年代综合研究 6, 377页)。但利鼎的腹部较大鼎要深, 蹄足也不如后者发达, 在该型鼎中属较早的形态; 且铭文中的册命地点 /般宫0, 不见于恭懿以后的金文, 因此我们认为利鼎可以早到中期晚段, 不排除属恭懿时期的可能。
- 陈梦家: 5西周铜器断代 6, 401页。
- 前者最早著录于 5西清古鉴 6 812, 图像见 5西周铜器断代 6 下册, 638页; 后者器形见容庚 5商周彝器通考 6 下册, 图五五六, 哈佛燕京学社, 1941年。
- 参看唐兰 5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征 6, 268页; 刘启益 5西周纪年 6, 151页。
-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: 5张家坡西周墓地 6, 368页,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, 1999年。
- 朱凤瀚: 5商周家族形态研究 (增订本) 6, 640~ 649页, 天津古籍出版社, 2004年。
- 盨既然自称 /小子0, 说明在穆恭之际的时候他还很年轻, 可能刚刚继承父亲的职位。
- 陈梦家: 5西周铜器断代 6, 169页。
- 器形见故宫博物院编 5故宫青铜器 6, 199页, 紫禁城出版社, 1999年。
- 保利博物馆藏应国再簋, 形制也与上述两器类似, 唯双耳作兽首半环形, 颈部饰鸟纹 (参看 5保利藏金 6, 岭南美术出版社, 1999年)。应侯再所作其他铜器出土于河南平顶山应国墓地 M 84 发掘者将墓葬年代定为恭王后期 (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 5平顶山应国墓地八十四号墓发掘简报 6, 5文物 6 1998年 9期)。传世的仲競簋 (7B783), 形态亦与上述诸器相似, 但为椭圆形, 圈足下有四小足 (参见 5商周彝器通考 6 下册, 图三一五), 刘启益先生定为穆王时器 (5西周纪年 6, 215页)。可见这种形式的簋主要流行于恭王时, 上限可能进入穆王。
- 参看注 ¼ 引郭沫若文; 彭裕商 5西周青铜器年代综合研究 6, 398页。
- 陈梦家: 5西周铜器断代 6, 203~ 205页; 唐兰: 5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征 6, /附件一0。
- 刘启益: 5西周纪年 6, 347~ 348页; 王世民等: 5西周青铜器分期断代研究 6, 89, 101页。
- 参看王世民等 5西周青铜器分期断代研究 6, 84~ 85页。
- 参看唐兰 5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征 6, 355~ 357页; 刘启益 5西周纪年 6, 222~ 223页。
- 禹鼎 (5B2833- 34) 铭文称其祖为 /幽大叔0。5左传 6 中郑庄公之母弟称 /大叔段0, 受封于京, 称 /京城大叔0; 周襄王母弟王子带称 /大叔带0, 为甘氏之祖。可见周代国君的同母弟地位特别高, 往往受封为独立的分族; 当时人称之为 /大叔0, 表明其与国君关系亲近, 地位尊贵; 后代称之为 /大叔0, 则表示其为本族始祖。
- 师旋能继承祖先孟的宗器, 说明他应该是这一家族的宗子。我们怀疑师旋与伯庸父为同一人, 一名一字, 陈梦家将 /旋0 字隶定为 /事0, /庸0 可训为 /功0, /事0 与 /庸0 意义相关。此窖藏其余铜器, 如伯喜簋、伯梁父簋, 年代亦与师旋簋接近, 他们跟师旋是什么关系, 目前还无法弄清。
-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: 5张家坡西周墓地 6, 66~ 78页。
- 梁星彭: 5张家坡西周洞室墓渊源与族属探讨 6, 5考古 6 1996年 5期。
- 考古研究所沔西工作组 5关于长安县张家坡铜器群出土情况的说明 6 记录窖藏 /在张家坡沔西砖厂的东门外 300米处 0 (5考古学报 6 1962年 1期, 12页), 而 80年代发掘的墓地就在沔西砖厂的位置。

(责任编辑 李自智)